

中国 国际比较中的 经济转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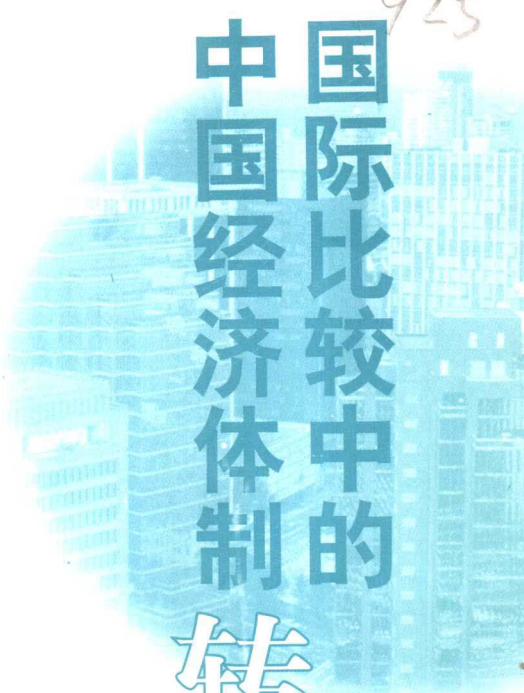


转 轨

江春泽 陈耀庭 雷 达 著

武汉出版社

111
D122
925



国际比较中的 中国经济体制 转轨

江春泽 陈耀庭 雷 达 著

武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江春泽等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 1997

ISBN 7-5430-1704-0

I. 国… II. 江… III. 经济体制改革 - 研究 - 中国 IV. F·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4381 号

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

江春泽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新华书店经销 湖北省孝感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5 插页 字数 27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7-5430-1704-0/F·129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序 言

转轨(或转型)经济学是近几年在国外刚兴起而且相当热门的一门经济学。它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种种经济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国外已出版了一批这方面的书,国内也有少数著作面世。

研究经济转轨中的问题是很有意义的,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时,一方面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存在很多的差异。《国际比较中的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一书,是从广泛的国际比较的角度,立足于中国的改革、总结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经验的一本专著。由于中国改革的成功已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兴趣,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转轨经济学的研究是一个贡献,定将在转轨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重视。

江春泽等同志都是研究比较经济学、特别是研究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经济颇有经验和成绩卓著的学者,这是本书成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的重要原因。

本书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收集了大量的国内外资料,其中不少是第一手的资料,这保证了本书得以翔实地、客观地对各国的经济转轨进行国际比较。这是许多同类著作所不及的。

第二,本书有相当强的理论性。转轨经济中的种种问题异常复杂,无论是西方的市场理论还是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都没有解

决问题的现成答案,那些理论也都不足以透彻分析这些问题。必须广泛吸收现代经济理论的成果并予以创新,才能把握转轨经济中的问题,孰非所掌握的资料。本书在理论上下了很大功夫,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实际中提炼理论,并用理论去观察实际,从而使本书达到了较高的理论高度。这也是同类著作所不及的。

第三,本书立足于中国来研究转轨经济学,这不仅有助于从国际比较中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得失,而且还有助于从他国经济转轨中吸取经验教训,从而推动中国的改革。这与只是一般地研究各国转轨中的问题却并无明确的目标的转轨经济学著作有明显的不同:那些著作大多只具有纯学术的特点,而本书则是一本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著作。

总之,我认为,这是在研究转轨经济学中颇具特色的、高水平的著作。

董辅初

1997年5月28日

江春泽 女,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科研部主任(正司级)、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耀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

雷达 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副主任。

目 录

序 言	董辅弼 1
-----------	-------

导 论	1
-----------	---

第一篇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16
----------------------------	----

第一章 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市场经济	16
-------------------------	----

第一节 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	17
---------------------	----

第二节 制度调整和经济体制转轨	21
-----------------------	----

第三节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	25
--------------------	----

第二章 现代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几种类型	31
---------------------------	----

第一节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31
----------------------	----

第二节 法国计划引导下的市场经济模式	39
--------------------------	----

第三节 日本政府导向型市场经济模式	45
-------------------------	----

第四节 美国政府微调型市场经济模式	52
-------------------------	----

第三章 西方发达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和现代 企业制度	60
------------------------------------	----

第一节 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的历史演进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的历史发展	60
--	----

第二节 现代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结构和私人企业	
------------------------	--

制度序列(上)	
——业主制企业和合伙制企业	63
第三节 现代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结构和私人企业	
制度序列(下)	
——公司制企业	71
第四节 现代公司制度和市场经济	80
第二篇 经济体制转轨的国际比较	90
第一章 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和任务	90
第一节 转轨经济学	91
第二节 经济体制转轨的目标和任务	99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成本	113
第二章 经济体制转轨方式的比较	116
第一节 不同转轨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117
第二节 “激进式”转轨模式	120
第三节 “渐进式”转轨模式	130
第四节 “被动式”转轨模式——德国东部案例	143
第三章 经济体制转轨的突破点、速度及比较	149
第一节 对转轨突破点和转轨速度的理论思考	150
第二节 转轨突破点的选择(上)	
——中国改革的实践	159
第三节 转轨突破点的选择(下)	
——俄罗斯、东欧国家的选择	169
第四节 转轨速度的选择	176

第四章 经济转轨的制约因素与实效比较	
——俄罗斯、东欧国家案例	185
第一节 社会与政治因素制约的比较	185
第二节 经济因素对转轨的制约	190
第三节 经济体制转轨的现状	199
第四节 转轨国家的经济实效比较	206
第五章 不同转轨模式开放度的比较	211
第一节 对外开放区位的转变	212
第二节 转轨国家对外开放进程	217
第三节 开放度的衡量	222
第四节 转轨中国国家国际竞争力比较	224
第五节 体制演变和对外开放	232
第三篇 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色	237
第一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与确立(上)	237
第一节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 成	238
第二节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两个阶段:放权让利与 制度创新	246
第三节 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和市场体系逐步发育	259
第二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探索与确立(下)	268
第一节 中国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268
第二节 新型宏观调控体系的探索	281

第三节 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	285
第三章 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特色	295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体制模式更新	295
第二节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化改革	303
第三节 局部试点、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310
第四节 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保持经济持续 增长和社会稳定	312
第四章 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的关系	322
第一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保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322
第二节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处理好几个 关系	326
第三节 “九五”期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与 措施	332
后 记	341

导 论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规划研究课题成果,属转轨经济学专著,也是中国人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总结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经验的理论著作。主题是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原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一世界历史现象。全书是在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理论以及美、德、日等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践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从广泛的国际比较角度,来研究转轨国家在转轨进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共同的重大课题。

如果查阅一下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世界各地召开的学术研讨会节目单,定能发现关于这一“过渡”现象的研讨主题占有相当的比重,可称得上是“热点”之一。不少国际组织也加强了对这一方向的研究或增加了对这一领域研究项目的资助。1992 年,笔者赴法国 OECD 总部和比利时 EEC 总部作短期研究时,发现那里从事这一方向研究的人员十分紧张繁忙,有人甚至在 1 个月内要乘坐 6 次飞机亲赴转轨国家实地考察或咨询。笔者在英国和美国学术界的朋友们往往利用寒暑假奔赴前苏联及东欧地区,观察转轨的实践,他们陆续寄来自己或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足见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受到世界关注的。研究的结论在世界范围内一般

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也“英雄所见略同”。包括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学者在内,关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认识一般都经历了从简单到深入、从冲动到冷静、从浪漫到现实、从突如其来到冷静思考的过程。对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经验,有的轻率否定,有的刮目相看。有些西方经济学者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就,但却认为中国经验纳入不了“规范”的经济学,甚至声称谁要能用“规范”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学术界也确实有些立大志者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和尝试。依笔者愚见,这里所谓“规范”的经济学是指西方经济学,它本来就解释不了中国的经验,因为西方经济学是历史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演变过程的经验总结。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目前只不过试图重复发达国家历史上走过的路,能否走通,能否走好,预期的目标能否实现,也是我们研究的内容。中国走的是一条新路,是要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把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其结果将既是新型的市场经济,又是新型的公有制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所谓“规范”的西方经济学都不可能包含的新现象。实践是理论的唯一源泉,理论必然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还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理论也将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和继续深化发展。本书作者不存有获诺贝尔奖金的奢望,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始人是邓小平,实践的推动者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当然,包括本书作者在内的众多经济学者,在这个过程中也作了有益的努力。1996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经济体制转轨的国际学术会议,邀集东西方学者来北京共同探讨经济体制转轨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本书作者献出此书来反映现阶段我们的认识,旨在“抛砖引玉”,以期在与国际学术界研讨中继续提高。

经济体制转轨之所以能够进行国际比较,是因为我们这里所谓的经济体制转轨,是特指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这里,首先有必要澄清的是,“计划经济”与“计划”不仅是名词与动词的区分,而是有不同内涵的两个经济范畴。“计划”可以泛指资源配置的方式之一或作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之一,它在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中也以不同形式被不同程度地采用着,而且,它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有形之手”与市场调节的“无形之手”结合运用,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优化的普遍趋势,是现代市场经济内生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经济”已经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特指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末这段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现象,是曾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标本的模式。它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苏联形成,随后在 14 个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它的基本特征是由中央政府作为全社会资源的直接配置者,政府以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中央计划的信息信号是数量,动员手段是行政指令。计划经济是作为市场经济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视市场机制为异己物。这种体制在战争和战后恢复时期,起过迅速汇聚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国家重点目标实现的历史作用,但由于这种体制没有客观规律表现的场所(市场),缺乏激励技术进步的竞争机制,而其必然伴生物是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因而运行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其发源地前苏联的增长率呈持续递减的趋势,直至停滞、负增长、衰退、20 世纪 80 年代末危机、20 世纪 90 年代初解体。与此同时,以前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内各东欧同盟国于 1989 年发生“剧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遂告终结。此后开始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并在国际范围内掀起了经济学界新的研究热点,进而兴起

一个尚未成熟的经济学分支——“过渡经济学”，英文词为 Transition Economics，我们把它称做转轨经济学。其实，它是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国际范围内兴起的比较经济体制学在 20 世纪 90 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因为比较经济体制学的主要内容是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体制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而转轨经济学也是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转轨的历史与逻辑的起点，而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研究起点模式如何向目标模式转换。对转轨进程进行国际比较，主要是比较各国转轨的战略选择是否正确，包括具体的目标模式、转轨的速度、具体方法与途径是否符合本国国情。检验转轨战略选择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是经济效果，因为体制转轨就是把“体制优选”作为一个重要手段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毫无疑问，发展目标实现的程度是转轨战略选择正确与否的试金石。

三

目前，处于转轨进程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由原来的 9 个国家分解为独联体各国及中、东、南欧共 27 个国家）以及中国、越南等欧亚国家。转轨情况大体可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一类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转轨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即由计划经济转换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体地说，转换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这种类型以中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部放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上向传统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基本属此类型，当然，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承国，又是大国，研究它的情况更具典型性。

从转轨的速度与方法来研究，有所谓“渐进”与“激进”之分。“渐进”也以中国为代表，曾经被通俗地、形象地喻为“摸着石头过

河”，而“激进”也可以俄罗斯为代表，被称为“休克疗法”。

从转轨的突破口来研究，中国是从农业和农村改革开始，俄罗斯是从私有化、价格与进出口贸易一步“自由化”开始。

西方舆论曾经把第二种类型的改革称之为“Big Bang”（有人译为“大爆炸”或“大跳跃”），这是借用圣经语言形容上帝在 7 天之内就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此来比喻这种类型的转轨国家由于政治突变，旧体制一夜之间被摧毁了，新体制随之也将被强制建立起来，于是，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指日可待了。西方学者曾宣称此类改革为“效益最大化”的转轨。

然而，事实又是怎样的呢？从 1990 年到 1994 年，这些国家的经济普遍出现了 1929 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区域性大萧条。它们普遍经历着破坏较大的“阵痛期”。“阵痛”的明显特征是：政治混乱，经济衰退。政治上的无序与混乱状况，使经济转轨也难以有序地进行，生产单位在无序的外部环境中，原有的产供销联系被中断或扭曲，国内缺乏统一的市场，国际市场更无竞争力进入，政府的地位极不稳定，作用极其有限，生产的下降必不可免。俄罗斯生产下降 50%，独联体另一些国家下降更多，东欧国家下降 18%~20%。生产如此急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不容乐观。1994 年，俄罗斯 60% 的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低于 1989 年。据欧盟 1995 年 3 月调查，东欧、独联体 27 个转轨国家中，只有捷克、爱沙尼亚、斯洛文尼亚、阿尔巴尼亚等 4 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比上年有所改善。

为实地考察转轨的真实情况，1996 年笔者曾去俄罗斯与政府经济官员、国家杜马议员、著名经济学家作了有益的直接面谈，取得了分析俄罗斯经济转轨的第一手材料。当然，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对有关经济转轨的重大问题，都有不同的见解，而且情况还在不断地变化。

四

1996年春,笔者在俄罗斯访问结束前,双方又一次交流了各自的学术观点。我们结合中国类型转轨的情况,谈了以下几点看法,在座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赞同。

首先,经济转轨需要有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来保证。这里,要恰当地处理好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有个流行的说法是中国只搞经济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这并不符合实际。1978年~1980年,中国在思想领域开展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当时,邓小平同志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是由于“真理标准”讨论带来的思想大解放,才有以后一系列经济改革的进展。随着经济改革的进展,政治改革还在不断进行。比如1980年8月中央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决定,改变了领袖终身制的做法,建立了领导干部退休制度,等等。但是,中国在政治改革方面确定的一系列方针,是保证经济改革所需要的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现在看来是十分正确的。比如,在处理“文革”动乱和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问题时,既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又号召党员、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向前看”,“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这样,就焕发了前进的朝气,而没有涣散人心。以后又明确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改革不能越过四项基本原则的限度,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这是中国到目前为止能保持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的最根本的因素。中国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越来越清醒地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认为改革是手段,发展是目的,稳定是保证。现在,中国人的思想很活跃、很开

放,但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我们坚持基本理论——邓小平同志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方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与此相对照的是,俄罗斯的主人告诉我们,现在俄罗斯没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没有主义,只有浪漫主义与实用主义”。西方人评论俄罗斯的现状是“没有执政党的多党制,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人们思想很乱,整个独联体确实处于“大失控、大混乱”的状态。

其次,关于经济转轨目标模式的选择问题。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改革断断续续,此起彼伏,其实质是为了转换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模式。各国改革历程之所以艰险而又未能寻找到适度的能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模式,主要是由于理论上的禁区,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截然对立的,不能兼容的。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或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都产生一个共同的误解,奉行一个共同的偏见,即视市场经济属资本主义特有,而把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模式定型为“计划经济”。于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信条就一直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固守这一信条以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西方经济学教条主义者又据计划经济之低效来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共同的偏见具体表现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国际范围内长期持续着,一轮又一轮,反反复复。很久以前,西方经济学界就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辩论的中心就是,由中央计划机关配置全社会的资源是否可行以及效率高低。自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以来,各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索又是反反复复,一轮又一轮,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前,这些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仍然视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的对立物、异己物,在实践中至多是不得不痛苦地